

清治時期臺灣鞋履文化之探究

蔡蕙頻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清治時期臺灣住民的鞋履文化。首先，清治時期臺灣民眾所穿之鞋履，充分展現臺灣文化中摻雜著「中國」與「在地」兩大因素的特徵，民眾習穿的布鞋多來自於中國沿岸各地，型態也與漳、泉、粵等原鄉較接近。另一方面，為適應臺灣特殊的氣候及環境條件，就地取材製成的草鞋亦成為在地民眾穿用鞋履之大宗，仰賴在地女性人力編織而成，即便晚清時期臺灣因開港而接觸西方經濟、宗教等勢力，卻少見到臺灣人受到西方文化而改穿皮鞋的現象，反而是西方傳教士或軍人在各地宣教或行軍時，多穿著草鞋，以適應臺灣特殊環境的變化。

其次，鞋履文化也突顯階層上的差異。中上階層的人家，因家境富裕，衣著鞋履日趨華美，不僅使用絲羅綢緞訂製各色鞋履，而且稍見破舊即丟棄，展現臺灣移墾社會中豪紳豪侈奢華的一面；一般民眾的鞋履則以黑色布鞋或草鞋為主，且為因應農耕的需要，多有終日赤足，僅在年節喜慶時穿著鞋履者。

第三，早期原住民多跣足，少部分文獻可見原住民穿著皮製鞋履追逐狩獵的紀錄。之後，隨著原住民的漢化，也可見到服飾穿著趨近於漢人的現象。

關鍵詞：鞋履文化、跣足、布鞋、草鞋、皮鞋

Footwear Culture of the Taiwanese during the period of Qing Dynasty

Hui-pin Tsai *

Abstract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on footwear culture of the Taiwanese during the period of Qing Dynasty Rule in Taiwan.

The features of footwear at the time fully demonstrated a mixture of Chinese and Taiwanese cultures. The materials for shoemaking came from China's coastal area and the styles of the shoes we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Han people's native places, such as Zhang, Quan and Yue (Guangdong). On the other hand,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limate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Taiwan, straw sandals made from local resources by women were most commonly worn by the Hans. Leather shoes did not become popular ev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culture after the ports were opened to foreign trad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brought the islanders into contact with the world's economies and religions. In fact, straw sandals were adopted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soldiers while preaching or marching in Taiwan so as to accommodate the island's surroundings.

Footwear also revealed class differences. People from upper-middle class families desired luxurious footwear. They not only wore shoes made from silks and satins but threw away used shoes still in very good condition, an example of the extravagance of gentry elite in the reclamation society of Taiwan. The common people at the time wore black cloth shoes or straw sandals in general. They were frequently barefoot all day for farm work and wore shoes only on special occasion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is period, the aborigines were barefoot. A small number of relevant sources indicate that they wore shoes made from leathers when they were hunting. Yet due to Sinicization, their garment became similar to the Hans

* Librarian,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later on.

Keywords: footwear culture, barefoot, cloth shoes, straw sandals, shoes made from leathers

清治時期臺灣鞋履文化之探究^{*}

蔡蕙頻^{**}

壹、前言

1911（宣統3）年，革命黨人之手結束了清帝國近300年的國祚。然而，帝國雖然氣數已盡，仍有一群衣冠不改的舊遺民，將他們的朝服慎重地保存起來，每逢重要節日，便穿戴起清代朝服翎帽，即使生活再清苦，也不典當清時朝服，以服裝來表現心中對清朝堅定不移的認同。¹ 服裝，是展現個人文化意識或國族認同的可視載體。

鞋履亦是如此，提起木屐，我們聯想到日本；談到木鞋，馬上喚起它是荷蘭傳統服飾的一部分；說到職業婦女，讓人想到高跟鞋；說到藍白拖，讓人想到內涵越來越豐富的「臺客」文化。今日，鞋履除了保護足部的原始功能之外，已經超越原先作為服飾的一部分，而提升為個人身分或品味的展現，甚至是身體實踐或國族認同極重要的代表，「足下」別有文章。

目前已有數位研究者關注臺灣的服飾演變，如葉立誠《臺灣服飾史》、² 蘇

^{*}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7年5月17日；通過刊登日期：2017年8月17日。

^{**} 國立臺灣圖書館編審

¹ 有關清遺民之研究，可參考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² 葉立誠，《臺灣服飾史》（臺北：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第2版）。

旭珺《臺灣早期漢人傳統服飾》³等研究談到清治以來臺灣人服裝文化的演變，但是多著眼於服裝的部分，幾乎沒有鞋履的研究。吳奇浩注意到清治時期臺人服裝漸趨奢華，1860（咸豐10）年以後洋貨輸入臺灣，讓本地的服飾文化受到新的刺激，日治以後更是伴隨著男性的剪辮，掀起一場服裝西化革命。⁴然而上述學者的眼光多數集中於日治時期的變化，有關清治時期臺灣人的服裝文化則大多簡要帶過，更遑論臺灣人穿鞋的歷史與文化。

此外，徐端儀在其研究中分析了日治時期解纏足或天然足等女性足部解放運動漸成風氣後，女鞋也從過去的三寸蓮鞋演變為西式高跟鞋，傳遞與過去不同的新式美感。⁵然而對於日治以前女性審美的標準，徐端儀以仕女畫為觀察對象，集中在服飾的特徵而非足部。黃靜儀則從荷治以來的文獻中注意到平埔原住民族有裸體的習慣，18世紀以後，雖然仍有半裸的習慣，但用來遮掩身體的布料，已選擇較能遮掩私密的質料；18世紀末期，隨著平埔原住民漢化程度日漸加深，逐漸養成穿著漢人衣鞋的習慣，並略加提及福佬婦女的纏足文化。⁶黃靜儀注意到平埔原住民的服飾文化相當程度地受到漢人文化的影響，那麼，漢人的服飾文化又是如何呢？關於此點，黃靜儀的觀察主要集中於平埔原住民，對於同時期漢人的穿著較少著墨，亦無論及1860年臺灣開港以後，民眾的服飾文化受到怎樣的衝擊與影響，值得吾人進一步關注。

至於漢人的穿鞋文化，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女性的纏足。黃依琳討論了清末民初纏足對於女性規訓之間的關係，也提及上海婦女在放足之後迎接新的足部時尚。江韋陵則以三寸金蓮的藝術表現來突顯臺灣傳統社會的審美觀。⁷清治時期

³ 蘇旭珺，《臺灣早期漢人傳統服飾》（臺北：商周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

⁴ 吳奇浩，〈喜新戀舊：從日記材料看日治前期臺灣仕紳之服裝變化〉，《臺灣史研究》，第19卷第3期（2012年9月），頁201-236；吳奇浩，〈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揉的臺灣漢人服裝文化（1624-1945）〉（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2年）。

⁵ 徐端儀，〈臺灣『水姑娘』百年物語——傳統理想女性美研究1861-1960〉（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⁶ 黃靜儀，〈平埔族婦女形象與角色的變遷（1603-1895）〉（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頁47-49。

⁷ 江韋陵，〈傳統社會審美觀之研究——以金蓮文化的藝術表現為例〉（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

臺灣的福佬人婦女之間同樣存在纏足文化，同時期上海婦女的足部樣態，理論上可以做為探討清治臺灣婦女弓鞋文化的借鏡。但可惜黃依琳對於纏足婦女的鞋文化僅概要討論，且其研究係以上海婦女為研究對象；江韋陵雖以纏足女性為觀察對象，但有關清治時期其他民眾的鞋履文化，則有待進一步開發。⁸

清治時期是臺灣史上重要的一段分期，在這段時期裡，原住民與漢人之間文化交互影響，臺灣逐漸成為一個由漢人主導的社會。由於漢人占多數，且伴隨著經濟與政治的強勢作用，臺灣人的服裝文化看似逐漸以漢人習穿的服飾為主，但是原住民在被漢化以前，仍然保有其穿著特色；另一方面，漢人的服飾雖和漳、泉、粵地原鄉類似，仍因應氣候條件或環境因素，發展出適應在地環境的服飾文化。

1895（光緒21）年臺灣被日本統治以後，便是在這樣的基調上，再加入日式及西式服裝元素，成為臺灣人的服飾文化。對日式服裝的迎拒，甚至一度是臺灣人知識青年展現其對政權與文化態度的指標。要討論日治時期臺灣人對服飾文化的多元表現以前，必得先認識清治時期臺灣人的鞋履文化。因此，本文旨在探討清治時期臺灣住民的鞋履文化，大量取材方志、採訪冊、遊記，甚至是老照片等文獻，藉以觀察原、漢交融之下的文化影響，並觀察清治晚期臺灣開港之後，伴隨著西方政治及經濟勢力進入臺灣，西方服飾文化是否對臺灣民眾的穿著選擇產生影響。在架構上，本文就物質的「供給」與「需求」面向思考，前者包含鞋履的「材料」與「製程」，而「需求」面則是爬梳商品流通到民眾生活使用情形，從「物質」至「物品」的產銷流程依序論述，盡可能關照鞋履在民眾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同時，留心不同時期（如臺灣開港前與開港後）、不同民族（如清代旅臺之中國官員、在臺活動的外國人與臺灣在地者）、不同階層（如富家大戶與中下階層）、不同性別（男性與女性）之間的穿鞋習慣，關注不同社群之間的「差異」。

然而在研究對象上，由於清治時期駐臺官兵之服飾配件有其既定的官方規範，較不受一般庶民大眾服飾文化之影響，故本文以臺灣民眾的鞋履文化為研

⁸ 黃依琳，〈1872-1934上海女性足飾流行變遷之研究——以《申報》為例〉（臺北：天主教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頁72-128。

究對象，暫不將官服鞋履列入討論範圍之中。此外，一地的政治，或可因戰爭、條約或占領等因素一夜易幟，但文化卻具有延續性，不隨政權轉移而有瞬間的改變，尤其日本領有臺灣之後，初期因忙著鎮壓各地的抗日勢力，以及摸索適合於本地的統治政策，對於臺灣人既行之舊慣保持較為寬容的態度，對於服裝鞋履未做強勢的規範與介入，因此日治初期日人對臺灣民眾鞋履穿著的觀察，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本文在必要時亦參考日治初期相關文獻，補充清治時期文獻之不足。

貳、清治時期臺灣人的鞋履

為探討清治至日治前期臺灣人穿用之鞋履，需先了解當時市面上所流通的鞋履類型及材質。本節旨在爬梳史料，從中整理臺灣人所穿之鞋履類型及材質為何，做為其後探討鞋履文化之基礎。

一、鞋履類型

根據清代史料中出現的各式鞋類的稱呼，計有「鞋」、「舄」、「靴」、「屨」、「履」、「屐」等數種。

「鞋」指一般無筒的平底鞋，或為一般所有的鞋履之代稱，如：林占梅詩有「東皋回首白雲巔，竹策芒鞋度曲旋」，⁹此句係詩人到林澗之間遊賞的紀錄，芒鞋即草鞋，陳肇興亦有「藥鼎丹爐供事業，桐鞋竹杖傲王侯」、¹⁰「白鬚紅帶意態閒，藤帽棕鞋標格美」¹¹等詩句，同樣用百姓慣穿的草鞋來比喻晚年人生回歸平淡的感觸；「棕鞋桐帽喜偷閒，強半生涯落寞間」一詩則以棕鞋桐帽這

⁹ 林占梅，〈自雙溪石閣晚歸〉，《潛園琴餘草簡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02種，1964年），頁83。

¹⁰ 陳肇興，〈觀我〉，《陶村詩稿全集》（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文獻叢書》，1978年），頁48。

¹¹ 陳肇興，〈蘇學士南海笠屐圖〉，《陶村詩稿全集》，頁30。

樣一般民眾的樸素扮相，將己身閒餘生活娓娓道來。¹² 在史料中，「鞋」又作「鞣」，如洪棄生〈關嶺歸途瑣記〉中即有「躡鞣藉草，倚杖摩崖。」¹³

此外，「舄」亦為鞋之意，鄭惠美研究指出「舄」是古代中國達官貴人在祭祀等重要場合所穿的雙層底鞋，底用較厚的木頭製成，鞋幫材料則為絲綢。¹⁴ 林爽文事件時，霧峰林家林石長子林遜之妻黃氏攜瓊瑤及甲寅兩子及一婢躲避戰禍於荒谷中，當時「棲風宿露，跋涉山壑，舄破足繭」，¹⁵ 鞋破之餘，只好採月桃葉充作鞋履，備極艱辛。

「屨」是單層底之鞋，有時亦指鞋類的總稱。¹⁶ 「靴」則又作「鞢」，短鞋曰「鞋」，長鞋曰「靴」，¹⁷ 清季《申報》中有劉銘傳曾「聞患腳痛，不能穿靴；接見屬員，亦祇著鞋云」，¹⁸ 可見靴與鞋實屬不同的鞋種。清治時期臺人似乎慣於日常之時穿鞋，正式場合穿靴，如《樹杞林志》內即載，官紳之家「家常常著色鞋；若見賓、承祭，則著靴」，至於襪則「多以洋布為之」。¹⁹

「履」則接近今日的拖鞋，以月桃等植物編成。詩人徐莘田曾撰基隆竹枝詞「情郎夜出打茶圍，腳曳拖鞋膊搭衣」，²⁰ 描寫男性夜裡腳跣拖鞋、身上隨意披件上衣就出門尋花問柳的樣態，透過此詩足見拖鞋在清治時期已是一般民眾常見的鞋款。

¹² 林占梅，〈遣興〉，《潛園琴餘草簡編》，頁28。

¹³ 洪棄生，〈關嶺歸途瑣記〉，《寄鶴齋選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304種，1972年），頁134。

¹⁴ 鄭惠美，《儒式婚服研究與設計》（臺北：中華亞太藝術文化交流學會，2015年），頁136。

¹⁵ 林獻堂等編，〈高祖考遜公家傳〉，《臺灣霧峰林氏族譜》（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98種，1971年），頁104。

¹⁶ 鄭惠美，《儒式婚服研究與設計》，頁136。

¹⁷ 田邊一郎，〈支那靴調查報告〉，《臺關》，第22期（臺北：臺關會，1908年2月），頁34。

¹⁸ 著者不詳，《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47種，1968年），頁1058-1060。

¹⁹ 林百川、林學源纂輯，〈風俗考〉，《樹杞林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63種，1960年），頁100。

²⁰ 徐莘田，〈基隆竹枝詞〉，收入諸家，《臺灣詩鈔》，第13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80種，1970年），頁234。

另一種拖鞋的款式則是「屐」，史料中多出現「木屐」一詞，指的是木製拖鞋，例如屠繼善記恆春民情為「老少人穿木屐行，不分天雨與天晴；東山遺製留東海，坐聽虛堂得得聲。」²¹ 無論晴雨，老少民人皆著木屐，走起路來發出「得得」響聲；1893（光緒19）年胡傳與友人王蔭昀寫〈臺灣秋興八首〉：「犬聲如豹吠村彪，蹴踏街頭木屐雙。」²² 清治時期詩人鄭大樞曾詠臺人秋天「處處登高屐齒忙」，並註「南人好穿木屐，以硃漆牛皮者為佳」，²³ 提示臺人素有穿木屐的習慣，較華麗的木屐甚至已經漆上紅漆，墊貼牛皮。

二、鞋履材質

臺灣各式鞋款的材質，可分為皮革、綢緞、棉布、草、材木等。

早期臺灣氣候與地形適宜鹿群生活，17世紀以來，因日本等國的需求量大、統治者徵收鹿皮以為賦稅，以及原住民的狩獵傳統之下，直至清治早期，鹿皮一直都是臺灣重要的貿易品及貨幣之一，²⁴ 鹿皮依其大小重量不同，可分為牯皮、母皮、未皮、躉皮、麇皮等5等，²⁵ 其中，躉皮為「黃黑色，去毛存韌，用以為襪；染皂，用以為靴。」²⁶ 可見靴是黑色的，而《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中亦載躉皮「可作靴襪褲烏、包袋等物。」²⁷

不過，臺灣雖然生產鹿皮，但由於鹿皮過去在方志中多列於「貨之屬」，也

²¹ 屠繼善，〈恆春竹枝詞十首〉，《恆春縣志·藝文》（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75種，1960年），頁248。

²² 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71種，1960年），頁124。

²³ 鄭大樞，〈風物吟〉，收入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藝文》（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1962年），頁596。

²⁴ 曹永和，《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青年曹永和的學術啟航》（臺北：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2011年），頁40。

²⁵ 余文儀，〈番社通考〉，《續修臺灣府志·風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21種，1962年），頁573。

²⁶ 陳文達，〈物產〉，《鳳山縣志·風土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24種，1961年），頁100-101。

²⁷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13種，1961年），頁413。

就是臺灣貿易外銷的主力商品，質佳價昂，雖然鹿皮被原住民作為衣飾或其他器用，²⁸ 但越到後來，真正以之做鞋而穿用者恐怕不多。一位日治時期的日本軍人中谷生回顧，直至日治初期，臺灣雖然生產大量的生皮革，卻非供島內自用，而是銷往日本或中國，製成鞋製品之後再銷回臺灣。當時在臺灣，首度大規模穿用皮鞋的是在臺的日本陸軍，其次是日本人官吏或銀行、公司職員，至於臺灣人則沒有穿著皮鞋的習慣。中谷生認為，這並非是臺人不穿鞋，具有相當智識的人物仍有穿鞋的習慣，只是當時臺灣人所穿用的鞋子是棉製鞋，鞋底則是使用品質不佳的中國製皮革，而中產階級以下的民眾則是赤足。²⁹

皮革製鞋，除了以鹿皮製成之外，《續修臺灣府志》亦有山羊「皮堪作鞋」的紀錄。³⁰ 而佐倉孫三《臺風雜記》寫到「臺人平素穿皮屐，不用木屐。其步街上，逢泥濘，不得進，是以大道概敷石疊墊，坦然如砥。漸久而車輪嚙之，生凹凸，且幅員狹隘，不得方軌，最可厭矣。」³¹ 此處所稱之「皮屐」應為皮製鞋底之鞋，佐倉孫三認為臺人習穿皮底鞋而不穿木屐，但是道路品質不良，遇雨即濘，不得行走，只得疊石鋪路才能前行。

不過，較皮鞋更為普及的是錦緞製鞋或布履。臺灣的漢人自中國東南沿海地帶的原鄉遷徙而來，一併帶來原鄉的鞋履穿著，但是臺灣「女人蠶桑不事、紡績少聞」，³² 早期臺灣內部紡織產業並不興盛。藍鼎元也注意到「臺地不蠶桑，不種綿苧」，³³ 島內缺乏紡織原料，民眾若有布帛的民生需求，在臺灣與島外的物資交換主要透過與中國各正口間的輸出入之下，相當程度還是必須仰賴中國，不僅《苑裡志》論臺灣的絲綢布疋「皆仰取江、浙、漳、粵。洋布，則各處轉販

²⁸ 曹永和，《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青年曹永和的學術啟航》，頁126-127。

²⁹ 中谷生，〈臺灣に於ける皮革工業の歴史を訪ねて〉，《經友》，第4卷第3號（臺北：臺灣軍經理團，1935年3月），頁43。

³⁰ 余文儀，〈鳥獸〉，《續修臺灣府志·物產》，頁627。

³¹ 佐倉孫三，〈街路〉，《臺風雜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07種，1961年），頁26。

³² 蔡振豐，〈風俗考〉，《苑裡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48種，1959年），頁82。

³³ 藍鼎元，〈經理臺灣疏〉，《平臺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4種，1958年），頁68。

而來」，³⁴《諸羅縣志》亦曾筆記臺灣「凡綾羅、綢緞、紗絹、棉布、葛布、苧布、蕉布、麻布、假羅布，皆至自內地」，³⁵雖然臺灣在地生產少量的布帛，但是不但產量不多，且品質不佳，難堪使用。

尤其，隨著臺灣移墾社會的發展，漢人在臺落地生根之後，財力日積月累之下，地方上逐漸出現富家大戶，生活無虞之下，進而追求更昂貴、更精緻的服飾品味。在鞋履方面，豪商巨賈不惜重資購置錦緞製成的鞋履穿用，以彰顯其身分，逐漸發展之下，中上階層以上的民眾之間逐漸產生競逐華美的風氣。像是《諸羅縣志》和《重修鳳山縣志》均曾載臺人「人無貴賤，必華美其衣冠，色取極艷者。靴襪恥以布，履用錦，稍敝即棄之。」³⁶《新竹縣志》亦載臺人「足穿曰靴」且「以緞為之」，指出較布鞋品質為佳的鞋款是以錦緞製成，且趨於破舊則棄之更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臺人慣穿的布鞋是左右不分的。根據日治初期民俗學者片岡巖走訪各地的紀錄，其《臺灣風俗誌》中提到：

布鞋即布履，近來雖然土人間流行起皮鞋，不少人穿著它，但是穿著用布片所製的布鞋的人，還是佔大部分。且其所使用的有布片、瓦斯物〔按：原文疑為girth，指訂製鞋〕、棉布者，材質不同但形狀固定，鞋的上端開口，但左右腳皆不固定，是可以左右腳交互穿的鞋子。底部則是以皮革製成，中則使用厚紙、布，中等品以一雙六、七十錢至一圓左右的價格販售。³⁷

最後是植物草本所編之鞋。臺灣的布帛雖然必須仰賴自中國輸入，但藺草等植物卻能在臺大量生產，臺中、大甲、苑裡一帶過去素以藺草產地而聞名，再加上當地婦女手巧，善於編織，藺草經常被編織成草帽、草蓆或草鞋等加工品，《臺灣日日新報》曾載文描述臺北、北投、桃園、臺中、臺南等廳下均盛產七島藺，長

³⁴ 蔡振豐，〈風俗考〉，《苑裡志》，頁84-85。

³⁵ 周鍾瑄，〈物產〉，《諸羅縣志·物產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1962年），頁194。

³⁶ 王瑛曾，〈風俗〉，《重修鳳山縣志·風土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46種，1962年），頁55。

³⁷ 片岡巖，《臺灣風俗誌》（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年），頁149。

久以來為臺灣人編織為草鞋、袋、藺筵（藺蓆）所用，³⁸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亦載「臺中大甲地方，產異草，柔軟如麻，細纖如練；可以織筵，可以製帽，可以作囊，可以組屨。」³⁹ 1897（明治30）年《臺灣日日新報》亦提到臺人素有於室內穿著日桃草及鹽草所製草鞋的習慣，總督府殖產部所提交給第六回關西聯合府縣共進會之臺灣在地特產中，即包含臺人普遍穿用之草履鞋。⁴⁰ 此外，一般的布鞋內部也會加墊草墊，稱為「苴」，連橫《臺灣語典》記載「苴，墊也。以皮墊鞋也。」⁴¹

叁、臺灣的鞋履製作與流通

經由上文的討論，我們了解臺灣人所穿用的鞋履之類型與材質。然而，這些鞋履材料，並非完全皆由臺灣在地生產，亦含臺灣未生產之物，因此必得仰賴與他地進行物資交換方能取得。那麼，臺灣的鞋履，究竟來自哪裡？其生產製程又是如何？本節旨在觀察臺灣人所穿鞋履之製造與流通，從物資流通的角度，突顯臺灣與中國在物資流通上的關係。

清治以後直到1860年臺灣開港和世界重新接軌為止，因清廷不許臺人與外國從事貿易，僅允許與中國沿岸正口從事對渡，臺灣的產品改由中國對外貿易流通，因此，臺灣逐漸喪失做為東亞貿易轉運站的地位，過去由臺灣直接與其他國家或貿易勢力交易的貿易型態，逐漸轉為和中國之間形成一種在貿易上高度的「區域分工」，臺灣向中國供應米、糖，以及樟腦、花生、麻、鹿皮等物產，亦從中國進口紡織品、建材、陶瓷、漆器、紙張、草蓆等日用品和手工業產品。⁴²

³⁸ 〈七島蘭の好望〉，《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1年7月16日，日刊5版。

³⁹ 佐倉孫三，〈大甲筵〉，《臺風雜記》，頁43。

⁴⁰ 「第一百五號草履鞋 係以日桃草及鹽草所製成，土人於屋內穿用之，在芝蘭溪州庄一帶製造，於臺北縣內各地販售，其價一個二錢。」〈殖產部出品解說（九）〉，《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897年5月6日，日刊3版。

⁴¹ 連橫，《臺灣語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61種，1963年），頁28。

⁴² 林滿紅，《茶、糖、樟腦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960-189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頁7。

由於臺灣流通的鞋種主要是布鞋與草鞋，對布帛的需求量大，然而臺灣內部紡織業並不興盛，因此，在臺灣與中國華南一帶城市的物資流通之下，臺灣的鞋襪多來自於中國。《臺灣通史》記錄了臺灣鞋襪以來自漳、泉者為多，後漸加入上海式：「鞋襪之屬，皆求於市。前時多自漳泉配來，亦有本地製者。建省以後，漸尚上海之式，裝飾之物，莫不皆然。而搢紳之家，日趨者美矣。」⁴³

至於鞋履如何製作，遍覽清代臺灣方志等史料，其內容並未對鞋履製程有詳細的描述，不過，日治初期《臺灣日日新報》提及臺灣人習穿之布鞋多自清國福州及廈門輸入，⁴⁴ 另一份完成於1908（明治41）年，由任職淡水稅關檢查課鑑定官補的田邊一郎對臺北三市街的中式鞋（支那靴）進行調查，其結果更進一步地說明中式鞋可分為「福州型」、「廈門型」、「廣東型」，以及改良自廈門型的「臺灣型」等4種，其中又以廈門型最為常見，福州型、廣東型次之，臺灣型最少。⁴⁵ 日治初期多以「支那鞋」稱來自中國的鞋子。⁴⁶

據調查，臺灣的製鞋可分為「半成品製鞋」及「完全本地製作」兩種。所謂的「半成品製鞋」，係指鞋面、鞋底、淌線（縫製鞋子時使用的苧麻線）、布述（鞋面與鞋底的接合面周圍所夾的綠色棉布）及中底皮等鞋履之零件，由島外輸入半成品後，再在臺灣進行；而「完全本地製作」則是布幫（鞋底用厚板布、鞋面用薄板布）、棉毡（鞋底用毡）、鞋面用布帛、鞋內用棉布、糝糊、白粉、馬古皮（鞋尖用黑色皮革）、淌線、布述、中底皮等材料，每樣都從外地輸入，在臺灣製鞋。因篇幅所限，各鞋型材料的產地與價格整理如文末「附錄1：臺灣鞋半成品之種類、產地及原價」，以及「附錄2：完全本地製作鞋之種類、產地及原價」。

有關鞋的具體作法，可分為「鞋底製作」、「鞋面製作」及「縫合」三部分

⁴³ 連橫，〈衣服〉，《臺灣通史·風俗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28種，1962年），頁604。

⁴⁴ 「靴店 本島人の穿用せる布鞋は多く清國福州及び廈門よりの輸入を仰ぎ居るものなるが…」〈本島人間の商況（承前）〉，《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3年12月10日，日刊2版。

⁴⁵ 田邊一郎，〈支那靴調查報告〉，頁25-26。

⁴⁶ 〈輸入商況〉，《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8年4月11日，日刊4版。

(如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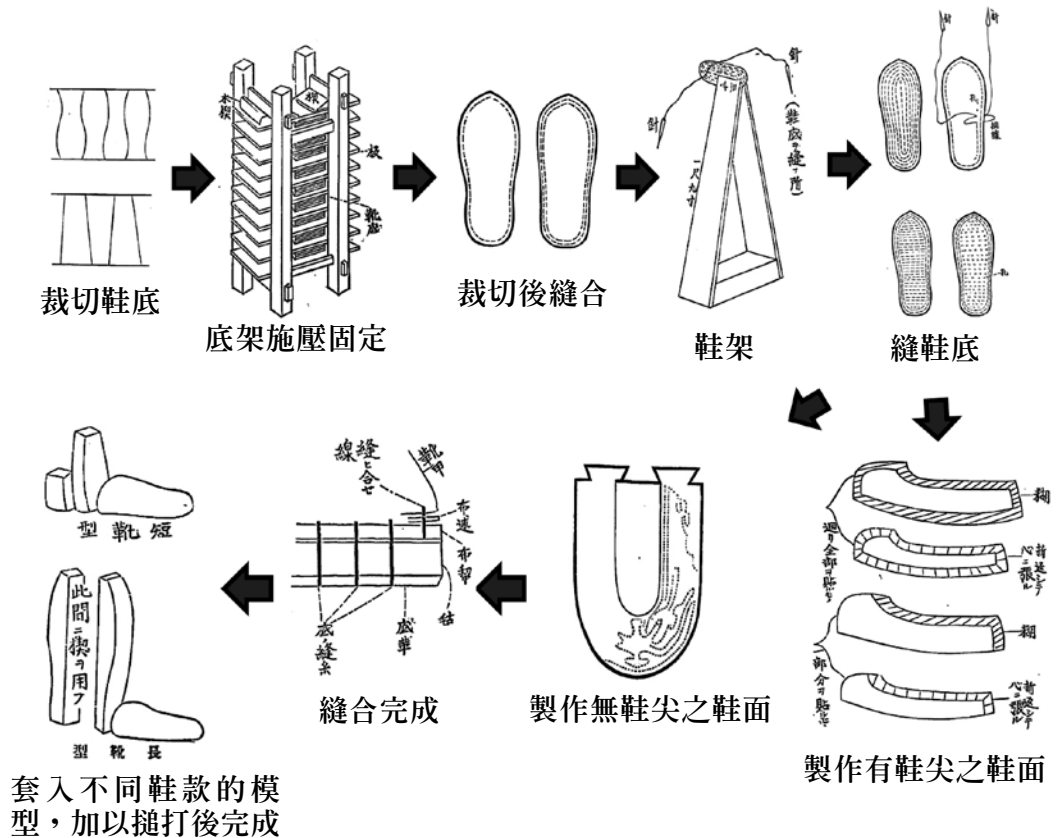


圖1、支那鞋製作流程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田邊一郎，〈支那靴調查報告〉，頁27-33。

「鞋底製作」部分，先在原料上裁切出波浪型或梯型布幫、底皮及棉毡，再將棉毡及水牛皮之間、布幫及中底皮之間以糨糊黏合，以底架施壓固定。牢固之後，再裁出鞋底型，將布幫與中底皮貼合之鞋底，周圍黏貼白色細織布，再將之與棉毡及牛底皮鞋底以淌線縫合一圈或兩圈完成。

接著將鞋底夾在鞋架上，以錐穿孔之後，用兩條線分別交叉穿過同一孔洞，縫法有圓型和平型兩種，縫製完畢後，鞋底製作完成。

「鞋面製作」部分，可分為有鞋尖及無鞋尖兩款。有鞋尖的鞋型係以鞋面布包覆較薄布幫（芯），製成左右兩片之後，再以鞋架縫合鞋尖處，接著以馬古皮縫合鞋根處，就完成鞋面的製作。無鞋尖的鞋型製法大致相同，差別在於鞋面裁切時切成馬蹄型，省去縫合鞋尖的工夫。

最後是將鞋底與鞋面縫合的工作。將鞋面布的外緣向內折，與鞋底之間再挾以布述，以柴篋將鞋面、布述及布幫縫合之後，此時將木製鞋模型塞進幾近完工的鞋子之中，以槌槌打塑型，稍加放置之後做最後的整理與修飾，在棉毡處刷上白粉後完成。⁴⁷

那麼，由誰來完成這樣繁複的製程呢？清治時期以來，已可見到臺灣的女性從事手工為業的紀錄，例如縫製衣物、編織帽蓆、揀選茶枝等，均以女工為之。而臺灣的鞋業，直至清治末期，臺灣產業的工業化發展均呈未開之趨勢，幾無可能以機器大規模製作，民眾腳上穿的鞋，除了直接自中國輸入鞋成品之外，半成品大多數應由女工的雙手完成。《安平縣雜記》提到，臺灣有「鞋店司阜」一職，「一切緞鞋、油靴、雨屐及各式綢布鞋，均能製之」，且「凡製就一鞋，必經數人之手而成；大半資於女工。」⁴⁸ 也有木屐司阜「以木削成」做屐；⁴⁹ 《噶瑪蘭廳志》亦有「女人工刺繡，善打草籽。一花，一卉，皆結緻精整，鮮明如畫。凡香囊、巾帕、荷包、肩袋及弓鞋珠小巧鍼黹，頗不減於蘇、杭。」⁵⁰ 《嘉義採訪冊》同樣稱嘉義地區婦女「勤習刺繡紡織之餘，多以裱紙做鞋為業。」⁵¹ 直至日治初期，仍有讚嘆臺灣人工便宜且婦女手工精巧熟練，配合臺灣盛產之蘭草，使臺灣草鞋編織業興盛的報導。⁵² 由此可知，臺灣各地，鞋履多經女工之手製成，且作工繁複，較大規模的製鞋鋪，鞋底由切底工、鑽孔工（又稱孔口

⁴⁷ 田邊一郎，〈支那靴調查報告〉，頁25-26。

⁴⁸ 著者不詳，〈工業〉，《安平縣雜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52種，1959年），頁83。

⁴⁹ 著者不詳，〈工業〉，《安平縣雜記》，頁88。

⁵⁰ 陳淑均，〈女紅〉，《噶瑪蘭廳志·風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60種，1963年），頁195。

⁵¹ 著者不詳，〈雜俗〉，《嘉義管內採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58種，1959年），頁21。

⁵² 〈七島蘭の好望〉，《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1年7月16日，日刊5版。

工）、縛底工分製，鞋面則有剪面工、糊面工、縫鼻工、滾口工分工完成，最後再由搗鞋工及放鞋工（又稱粉鞋工）修製完成，完全純手工製作，產量依工作內容而有所差異，快的話可日產20雙。⁵³

除了鞋鋪替人製鞋、銷售鞋履之外，民間亦可見到替人製鞋的例子，例如苗栗地區的節婦徐氏友妹矢志守節，善事舅姑，即使他人勸其改嫁，友妹仍不從，「晝助耰耨，夜織屨襪」，替人織鞋襪以維持家計。⁵⁴ 又有竹北地區節婦黃細妹，25歲亡夫，於家中田園種蔬鬻市，或替人縫鞋襪營生，以充養親撫兒之資。黃細妹之後甚至被北埔公學校聘為裁縫教師。⁵⁵ 1860年代來到臺灣的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也曾在探訪他一位住在安平의 漁人朋友時，見到他的女眷們圍在他們的四周「忙著編網、做衣服、縫製繡花鞋等工作」，⁵⁶ 足見製鞋確實是倚賴女性巧手縫製。

鞋履的流通方面，儘管史料中也有記錄赤足的現象，但是作為服飾配備之一的鞋履，清治時期已是民眾生活中常見的服飾元素，漢人聚落中必有鞋商，1770（乾隆35）年澎湖通判胡建偉所著之《澎湖紀略》即提到媽宮（馬公）右營直街及右營橫街皆有「鞋襪鋪」。⁵⁷ 清時秀才許南英的父輩之中，即有經營鞋帽者。⁵⁸

在來源上，「廣東型」係經由香港雜貨商輸入，「福州型」則是由福州雜貨商輸入或製造，「廈門型」除了少數是輸入半成品之後進行加工製成之外，多數則是由臺灣商人各自製造，而「臺灣型」是廈門型製造商改良製作而成。⁵⁹

⁵³ 田邊一郎，〈支那靴調查報告〉，頁33。

⁵⁴ 鷹取田一郎，〈臺灣孝節錄〉，收入吳德功，〈彰化節孝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頁78。

⁵⁵ 鷹取田一郎，〈臺灣孝節錄〉，收入吳德功，〈彰化節孝冊〉，頁78。

⁵⁶ 必麒麟（W. A. Pickering）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臺北：原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頁69。

⁵⁷ 胡建偉，〈街市〉，〈澎湖紀略·地理紀〉（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09種，1961年），頁44。

⁵⁸ 許贊堃，〈窺園先生詩傳〉，收入許南英，〈窺園留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47種，1962年），頁234。

⁵⁹ 田邊一郎，〈支那靴調查報告〉，頁25。

肆、清治時期臺灣人的鞋文化

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階層，甚至是不同的場合，都有可能影響民眾穿鞋與否，或是穿什麼樣的鞋，本節分別以「跣足、赤足」、「原住民的鞋」及「漢人的鞋」等3部分探討臺灣人的鞋履文化，並時時留意臺灣開港後來到本地的外國人及其服飾文化，是否影響臺人的鞋履習慣與品味，以及臺人女性所穿之鞋履，突顯性別的差異。

一、跣足、赤足

探討清治時期臺灣人的鞋文化之前，我們必須知道，無論原住民或漢人，「赤足」或「跣足」，長期以來都是臺灣社會中非常常見的現象。

陳第〈東番記〉：「性好勇喜鬥，無事晝夜習走，足蹋皮厚數分，履荊刺如平地」、西拉雅族人「不冠不履，裸以出入，自以為易簡云。」18世紀時，南臺灣瑯瑤原住民「男女皆跣足裸裎」，⁶⁰《諸羅縣志》記中部原住民亦是「跣足而無首飾耳」。⁶¹岸裡、內幽、噶吧嘰、茅匏、阿里史諸社人「露臂跣足」，登山如飛。⁶²不過，平埔原住民在與漢人接觸之後，文化受到影響，原本赤足的平埔原住民「近或衣衫履屨，彷彿漢製。南路番婦竟有纏足者。」⁶³

一直到19世紀中、後期，陳培桂論北部原住民仍然是「裸形跣足鬍髻髮」，⁶⁴姚瑩則看到原住民「食無烟火沉炊爨，男女赤足垂雙環」，⁶⁵丁紹儀也

⁶⁰ 王瑛曾，〈番社風俗〉，《重修鳳山縣志·風土志》，頁77。

⁶¹ 周鍾瑄，〈番俗〉，《諸羅縣志·風俗志》，頁156。

⁶² 范咸，〈番社風俗附考〉，《重修臺灣府志·風俗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05種，1961年），頁447。

⁶³ 朱景英，〈記社屬〉，《海東札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9種，1958年），頁59。

⁶⁴ 陳培桂，〈社寮雜詩〉，《淡水廳志·附錄二》（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1977年），頁420。

⁶⁵ 姚瑩，〈臺灣行〉，《中復堂選集·後湘二集卷一》（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83種，1960年），頁192。

認為多數的原住民「皆赤足，不知有鞮履。」⁶⁶ 僅土官有穿鞋，⁶⁷ 可見即使歷經了數個世紀，除了少數受到漢化的原住民之外，大多數的原住民是不穿鞋的。

至於漢人民眾，由於清治時期臺灣仍以農業為主，除了中上階層以上人家之外，一般民眾多以農耕為業。而在田地裡耕作時，赤足更便於行走活動，因此農民一般並無穿鞋的習慣，僅在喜慶或重要活動時穿鞋襪，像是澎湖地區的漢人習尚即是「家有喜慶時，則穿鞋襪；平日俱皆赤足。」⁶⁸ 新竹地區亦是「赤腳耕鋤，其情狀如繪。」⁶⁹ 記錄清治末期北臺灣民眾生活樣態的〈臺遊筆記〉則寫臺北居民「短後跣足，不事生業。」⁷⁰ 此外，客家婦女與奴婢不纏足，劉家謀提到「婢皆大腳跣足，或指配與人，始得穿履。」⁷¹

然而，歷史上可見的赤足，其原因並非全然是不知道鞋履為何物，有時可能是刻意為之。赤足儘管有無法保護足部免於受傷的風險，但卻有著機動性高的優點。相傳鄭成功在訓練軍隊時，要求將士不得穿鞋，因為海外多淤泥陷沙，赤足不禪可免雙腳受陷於泥沙之中不便移動，為了使其在驚滔駭浪之中仍然能夠「無異平地，跳躑上下，矯健如飛」，赤足練兵是鄭氏的獨特兵法，若見有人穿靴履，必遭罵斥。⁷² 林爽文事件時，藍元枚率兵與起事者於彰化一帶對戰，遇雨，溝圳水滿漲，舉目泥濘。起事民人因赤足，即使陷於泥濘之中仍然健步如飛，所向披靡，反而是官兵「徒涉或蹶躓」，⁷³ 寸步難行，可見一般官兵雖著官服，習於穿鞋，但在軍事作戰之中，赤足反而是一種軍事策略。

此外，清治時期臺灣道路品質普遍不佳，也是民眾行走時選擇赤腳的原因，

⁶⁶ 丁紹儀，〈番俗〉，《東瀛識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種，1957年），頁75。

⁶⁷ 余文儀，〈番社風俗〉，《續修臺灣府志·風俗》，頁518。

⁶⁸ 胡建偉，〈習尚〉，《澎湖紀略·風俗紀》，頁148。

⁶⁹ 鄭鵬雲、曾逢辰，〈新竹縣志初稿·考一 風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61種，1959年），頁179。

⁷⁰ 閩名，〈臺遊筆記〉，收入諸家，《臺灣輿地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16種，1965年），頁101。

⁷¹ 中谷生，〈臺灣に於ける皮革工業の歴史を訪ねて〉，頁43。

⁷² 范咸，〈災祥附考〉，《重修臺灣府志·雜記》，頁564。

⁷³ 著者不詳，《平臺紀事本末》（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6種，1958年），頁36。

來自加拿大的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在1872（同治11）年來到臺灣以後，經常脫掉他的鞋子，赤足往來於城鎮之間的鄉間小路上，因為當時不僅道路崎嶇不平，每逢下雨更是滿地泥濘，穿鞋反而使腳步黏滯，不利行走。我們以1875（光緒元）年5月23日馬偕在前往三重埔布教的路途為例：

行走在稻田間狹窄滑溜的泥土路上，路途雖短，然而！實在超乎筆墨所能形容的，幾乎每一步都會跌倒，滑入旁邊淹滿水的稻田或是兩旁的圳溝當中。⁷⁴

而他前往洲裡（蘆洲）的路上，也曾苦不堪言地說到：「噢！是什麼樣的路啊，這裡所說的路事實上只是爛泥。每走一步，爛泥都會深到膝蓋。滑溜而可怕的路況。」⁷⁵ 當他到了豪雨中的艋舺，那裡的「街道就像溪流」。⁷⁶ 即使到了清治後期，臺灣的道路品質依然時時刻刻試煉著馬偕徒步傳教的決心，他的日記中，經常出現他與學生在宣教的路上滑倒、跌落田中的紀錄。

面對這樣讓他們「跌倒了再爬起來」的道路，馬偕等人選擇的方式是先將鞋子脫下，直到抵達目的地之後，再將鞋穿起來。1873（同治12）年，馬偕是這樣到達新竹地區的：

早上我們並沒有回去大路，而是赤腳經過肥沃以及開墾得很好的山谷而行，最後在傍晚時我們回到大眾行走的大路，很快就到達竹塹。進入已經描述過的旅店中。我們到達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來，馬上有數十人前來討求藥品。他們甚至等不及我們洗腳穿鞋，就不停的要擠進來。⁷⁷

除了馬偕等人經常赤腳在各地行走之外，從其所留下的照片中看見，這時候的臺灣原住民女性，依然是赤腳的（如圖2），逢喜慶時始穿鞋襪。

要言之，赤腳的現象不完全僅是因為鞋履文化尚未普及，或服飾文明尚未發

⁷⁴ 偕叡理（Rev. 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 I 1871-1883》（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12年），頁221-222。

⁷⁵ 偕叡理原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 I 1871-1883》，頁109。

⁷⁶ 偕叡理原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 I 1871-1883》，頁508。

⁷⁷ 偕叡理原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 I 1871-1883》，頁121。



圖2、赤足的臺灣原住民女性

資料來源：George Leslie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Chicag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6), p. 112.

展至相當程度，有時也是因為作戰、農作或道路品質不佳等特殊的環境條件所衍生出的一種對策。

二、原住民的鞋

透過1650年代末訪臺的水手萊特（David Wright）的眼睛，我們了解新港一帶原住民的腳是這樣的：

他們既不穿鞋，也不穿襪；可是有的會穿一些野地鞋，用山羊皮所製，然後用小繩子繫起來。⁷⁸

萊特所見的臺灣原住民，已有部分有穿鞋的習慣，且有綁腿；女性則大多穿得和

⁷⁸ 鄭維中，《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臺北：如果出版社，2006年），頁75-76。另一則記載則是提到萊特形容原住民「既不穿鞋，也不穿襪子。但有時穿一種淺口鞋或涼鞋，是用羊皮做的。他們綁在腳的上面。」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 *Note of Travel in Formosa*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2012), p. 212. 引自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原著，費德廉（Douglas L. Fix）、蘇約翰（John Shufelt）主編，《臺灣紀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年），頁204。

男性一樣，亦不穿鞋。⁷⁹

17世紀中期在臺灣各處遊歷的德國士兵司馬爾卡頓（Carspar Schmalkaden）則看到原住民「男人們只用一小塊棉布或是一片破布，綁在臀部的地方。有些只以一塊破物或一塊獸皮當作短圍裙擋在前方，後面就什麼也沒有。但有些人為了要體面一點，穿著亞麻布褲子和短上衣，有些則是有褲無衣，有些則是有衣無褲，仍然圍著短圍裙。」女人身上也是一塊布巾，冬夏的差異，只是在於夏著麻布，冬披獸皮，⁸⁰ 似無穿鞋的習慣。

由於原住民族別不同，生活的環境也不一樣，無法一概而論，然而從史書中判斷，雖然大多數均記載原住民以赤足為多，但18世紀時，已有原住民在生活中使用鹿皮或穿著鹿皮的習慣，《諸羅縣志》即載當地原住民「出入負鹿皮，日藉以坐，夜則寢之，道路風寒，則披之於背」；陳雲程〈閩中摭聞輯〉詩云：「北地乍寒偷射獵，人人盡是鹿皮翁」，天寒時穿鹿皮保暖係為原住民常見的衣著選擇，⁸¹ 《清稗類鈔選錄》亦錄：「臺灣番人每以鹿皮藉地為臥具。遇雨，即以覆體。」⁸²

原住民亦不乏以鹿皮做鞋者，例如南臺灣的山豬毛等4社、傀儡山等27社已將鹿皮製成鞋履，⁸³ 作法是「剝生皮刺眼，四周約以繩，制如芒鞋」，並將之漬入咬丁皮（茄籐皮，又名海蒹葭，可染色）⁸⁴ 汁液中，漬後「入水不濡，堅久倍於他履」，⁸⁵ 皮質變得防水而堅韌耐用，可在捕鹿時穿著，避免奔跑驅逐中受傷。⁸⁶

⁷⁹ 鄭維中，《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頁75-76。

⁸⁰ 鄭維中，《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頁132。

⁸¹ 陳雲程，〈閩中摭聞〉，收入諸家，《臺灣輿地彙鈔》，頁31。

⁸² 徐珂，《清稗類鈔選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14種，1965年），頁130。

⁸³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所載其「以鹿皮為袴、為履。」王瑛曾，〈番社風俗〉，《重修鳳山縣志·風土志》，頁74。

⁸⁴ 周鍾瑄，〈物產〉，《諸羅縣志·物產志》，頁196。

⁸⁵ 周鍾瑄，〈番俗〉，《諸羅縣志·風俗志》，頁157。

⁸⁶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中提到山豬毛等4社、傀儡山27社風俗為「捕鹿時，以鹿皮為搭身、皮帽、皮鞋，馳逐荊棘，不畏險阻。」王瑛曾，〈番社風俗〉，《重修鳳山縣志·風土志》，頁72。

不過，隨著漢人活動範圍的擴大，原漢之間文化彼此交雜，也可見到原住民逐漸受到漢人的影響，服飾穿著日漸受到漢化。1695（康熙34）年，臺灣知府靳治揚於臺灣、鳳山二縣下「熟番」設置社學，對平埔原住民施以漢化教育，之後甚至還由巡臺御史召集學童試之。⁸⁷ 18世紀中期來到臺灣視察的巡臺御史六十七，將其於臺灣所見所聞命畫工繪成「番社采風圖」，其中在《番社采風圖考》中留有「社師」一幅之說明：

南北諸社熟番，於雍正十二年始立社師，擇漢人之通文理者給以館穀，教諸番童，……番童皆薙髮，冠履衣布帛如漢人……。⁸⁸

經過經年累月的社學教育之下，原住民學童在外貌及服裝上已與漢人無異，且「社師」一圖所繪在社師中就學之學童，亦已穿著漢人習穿之鞋。略略早於六十七來臺的黃叔璥，也在《臺海使槎錄》中記述北路嘉義一帶，諸羅山、哆囉囑、打貓的原住民「社中亦間有倣漢人戴帽著鞢者」。⁸⁹ 而這些人有些是與漢人較常接觸的土官，黃叔璥看到竹塹、貓裏、大甲一帶的土官「多用優人蟒衣、旱鞋、漢人絨帽」，⁹⁰ 和漢人的服飾無異，可見民族之間文化交融的現象，也表現在服裝上。

三、漢人的鞋

對漢人而言，鞋子雖非完全是生活必需品，但並非稀有少見的服裝配件，由於鄭氏王朝與清朝均有其既定的服飾穿著，鞋子常常成為新的政權在收編前朝遺臣舊將，或是納入新附民時的贈與物之一，透過將代表該政權的衣服冠履贈予臣服者，作為接受其投降的象徵。從17世紀《熱蘭遮城日誌》（*The Day-journal of Fort Zelandia*）的記載中可知，鄭成功一面包圍熱蘭遮城逼迫荷蘭人投降，一

⁸⁷ 蕭瓊瑞，《島民·風俗·畫：十八世紀臺灣原住民生活圖像》（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3版），頁283-284。

⁸⁸ 白麓六十七居魯甫（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出版項不詳），未標頁碼。

⁸⁹ 黃叔璥，〈北路諸羅番二〉，《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1957年），頁101。

⁹⁰ 黃叔璥，〈北路諸羅番九〉，《臺海使槎錄》，頁130。

方面對山區與平原的平埔原住民招降，當時「每位投誠的長老都獲賞一件淡色絲袍、一頂燙金頂帽子，以及一雙漢式長靴。」⁹¹ 同樣地，當施琅征服鄭氏政權時，來到臺灣之後，也贈與降將袍、帽、外套、靴全副，至於各鄉社百姓及「土番」，則「酌量給賞銀牌、袍、帽、靴、煙、布疋」等物。⁹² 而藍鼎元前往卑南追索朱一貴事件中逃亡黨人時，曾「往諭卑南覓大土官文結，賞以帽靴、補服、衣袍等件」，⁹³ 要求原住民協助搜尋山中餘黨。足見服飾鞋襪等物，被當政者拿來作為收服他地民眾的象徵。

此外，漢人的生命禮俗之中，也不乏贈送鞋襪以表感謝或祝福的傳統，例如漢人男女訂婚時，男方託媒人將聘金聘禮送至女家，為訂盟納采之禮，女方回復婚書，除以糕餅時果贈答以外，又「以紅帽、緞靴、袍褂、鞋襪及荷包、扇袋、書籍、筆硯之類饋婿」，⁹⁴ 澎湖地區則是女方須回禮番銀3圓「以為折買鞋襪之禮」；⁹⁵ 生育男女之後，至周歲時外家需「送衣帽鞋襪及桃麵紅雞之屬」云云。⁹⁶

而漢人日常生活中所穿的鞋類，《新竹縣志初稿》記載竹塹地區民眾服飾分為寒、暑兩季，均有禮服、常服之別，禮服之鞋襪，男性「足穿曰靴」，並以緞為之，女性「足穿亦曰靴」；至於常服，「足穿曰襪、曰鞋」，另有束住襪與褲者，曰褲褪。⁹⁷ 而苑裡一帶則與之類似，「官紳家有事，則著靴；色鞋，其常著也。俗人，則以烏布鞋、蒲草鞋代之。」⁹⁸ 指出經濟條件較佳的人家，會因應不

⁹¹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 Company and Yokohama, Shanghai,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Kelly & Walsh Ltd., 1903), p. 38. 此處引自達飛聲（James W. Davidson）原著，陳政三譯著，《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上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4年），頁44。

⁹² 施琅，〈舟師抵臺灣疏〉，《靖海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3種，1958年），頁51。

⁹³ 余文儀，〈文移〉，《續修臺灣府志·藝文》，頁738。

⁹⁴ 連橫，〈冠婚〉，《臺灣通史·風俗志》，頁608。

⁹⁵ 林豪，〈儀文〉，《澎湖廳志·風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64種，1963年），頁312。

⁹⁶ 林豪，〈儀文〉，《澎湖廳志》，頁315。

⁹⁷ 鄭鵬雲、曾逢辰，《新竹縣志初稿·考一 風俗》，頁178-179。

⁹⁸ 蔡振豐，〈風俗考〉，《苑裡志》，頁84-85。

同場合穿著不同的鞋子，然而一般民眾之間較普及的是黑布鞋或草履，也就是草鞋（如圖3）。日治以後，日本人也注意到不同階層的臺灣人穿不同的鞋子，例如1899（明治32）年《臺灣協會會報》記錄了當時臺灣人習穿的服裝，其中，有關鞋履的部分，則為「穿著襪（足袋）靴的是中等以上人家，從事下等勞動的人則為赤腳，或穿草鞋。」⁹⁹而西岡英夫則進一步說明富人雖然「腳上穿的是上部為布帛，下部為皮革的鞋。穿著不用釦子和橡膠的短鞋，穿的時候也會穿襪。」不過一般大眾則以裸足為主，即使是天氣炎熱，地面蒸騰，民眾仍能很自然地赤足行走，令他吃驚。¹⁰⁰

草鞋在民眾之間普及，係因其具有輕便柔軟、便於活動的優點，《臺案彙錄》庚集中，1790（乾隆55）年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的覺羅伍拉納在奏辦遞夫予草蓆、草鞋等物品時就曾說過，臺灣「處處山嶺，石子鋪砌，道路滑溜，各夫往來跑遞，非穿草鞋不能迅速。」¹⁰¹

19世紀後期，因牡丹社事件而前往屏東採訪的美國記者愛德華·豪士（Edward H. House）因臺灣氣候炎熱而穿著草鞋，他直言，走在需要經常涉水的道路上，草鞋比皮鞋更好用。¹⁰²臺灣氣候炎熱潮濕，草鞋更能適應炎熱地區多變的氣候條件，且其價格低廉，所用材料又為臺灣島內生產的藺草，取材容易，都讓草鞋便於普及。而馬偕與他的學生在臺灣各處宣教時，有時是赤腳行走，有時則是因地制宜穿著草鞋，有時也穿漢人包鞋（如圖4）。事實上，皮鞋並不適合臺灣潮溼炎熱的氣候，在臺灣穿著皮鞋的仍以外國人居多（如圖5）。

⁹⁹ 著者不詳，〈臺灣的衣服及家屋〉，《臺灣協會會報》，第7號（東京：臺灣協會，1899年4月），頁64-65。《臺灣紀要》亦有相同記載。村上玉吉，《臺灣紀要》（出版項不詳），頁105。

¹⁰⁰ 西岡英夫，《台灣の史的環境と被服並にその資源》（出版項不詳），頁63。

¹⁰¹ 〈兵部「為內閣抄出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奏」移會〉，著者不詳，《臺案彙錄》庚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00種，1964年），頁328。

¹⁰² Edward H. House, *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 (Tokio: Unknown, 1875), p. 117. 此處引自愛德華·豪士原著，陳政三譯述，《征臺紀事——武士刀下的牡丹花》（臺北：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頁156。



圖3、甘為霖（Rev. W. Campbell）與信徒合影

說明：從甘為霖與信徒合影中可見中等以上人家穿著烏布鞋。

資料來源：Rev. W.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London: Marshall Brothers, 1915), p. 24.



圖4、馬偕出外傳教留影

說明：馬偕至各地傳教時，經常穿著草鞋，以適應臺灣的潮濕天氣與道路條件。

資料來源：George Leslie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Chicag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6), p. 172.



圖5、穿著皮鞋的必麒麟

資料來源：W. A. Pickering C.M.G., *Pioneering in Formosa*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898), p. 232.

另外，婦女的鞋履則另有故事。除了中上階層人家的婦女之外，一般人家的婦女因需操持家務，或參與農事勞動，故未纏足。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中，刊載許多日治初期日人來臺後所繪之圖，其中有關女性足部圖像，除一般的布鞋之外，亦有織有花樣的繡花鞋。另外，也可看到多了鞋帶以綁繫於踝部的鞋款（如圖6），展現出女性不同於男性的服飾審美。

但婦女纏足的現象仍引人注目。女性纏足，表面上是一種特有的足部審美標準，但其背後牽連著男尊女卑的傳統家庭價值下，易於控制女性行動的動機、不須大量勞動的功能性，以及其作為彰顯富貴人家對自身財力及女眷教養的階級文化象徵，¹⁰³ 致使部分福佬人女性素有自幼纏足的習俗。連雅堂在《臺灣通史》中載「漳泉婦女大都纏足，以小為美。三寸弓鞋，繡造極工」，而「粵人則否，耕田力役，無異男子，平時且多跣足。」¹⁰⁴

¹⁰³ 柯基生，《千載金蓮風華：纏足文物展》（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3年），頁24-27。

¹⁰⁴ 連橫，〈衣服〉，《臺灣通史·風俗志》，頁6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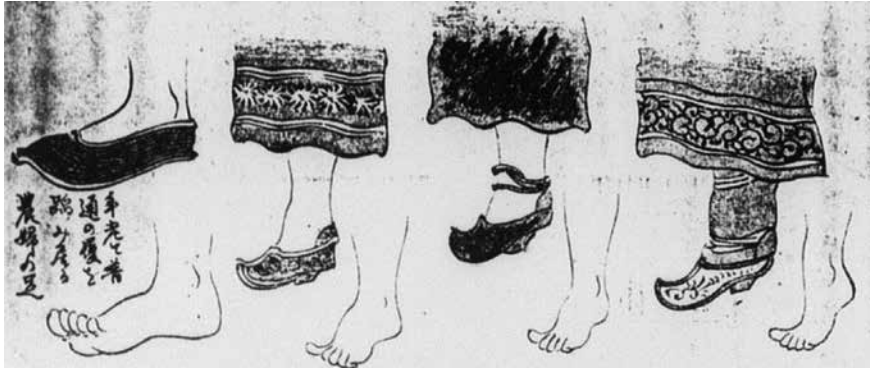


圖6、日治初期日人所繪之臺灣婦女足部及鞋履

資料來源：著者不詳，《風俗畫報臨時增刊 臺灣征討圖繪》，第98號（東京：東陽堂，1895年8月），頁27。

纏足婦女所穿之鞋多稱為「蓮鞋」或「弓鞋」，尺寸精小，做工細緻（如圖7），高彥頤探討了古代中國的金蓮文化演變。¹⁰⁵ 在臺灣，王育德回憶起纏足說：「纏足是將小腳漂亮地緊緊綁住，再穿上玲瓏小巧的紅布鞋。」¹⁰⁶ 只有「婢女又叫赤腳仔（chhiah-kha-á），是不纏足的。」¹⁰⁷ 馬偕也在日記裡寫到一位名叫小珍（Tin-a）的漢人女孩「在四歲時，她還胖胖的腳趾頭就得被彎向下面與腳掌緊貼著，然後還被用棉布帶子緊緊的纏起來，之後把這腳塞進一隻尖頭的小鞋子內。大拇指就成為整隻腳的主要部分，而她必須日夜都穿著這隻令人厭惡的鞋。」¹⁰⁸ 研究者則提到，品足的規格為「上、瘦、彎、軟、稱」。臺灣的弓鞋

¹⁰⁵ 高彥頤（Dorothy Ko）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7年）。有關臺灣人的纏足文化，另可參考金湘斌、游鑑明、張淑雯等人之相關討論。金湘斌，〈纏足から天然足へ：日本統治前期（1895-1925年）台湾における学校女子体育に関する研究〉（金沢：金沢大学大学院人間社会環境研究科博士論文，2013年）；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張淑雯，〈日治時期臺灣解纏足運動之研究〉（虎尾：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¹⁰⁶ 王育德，《王育德自傳》（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頁10。

¹⁰⁷ 王育德，《王育德自傳》，頁10。

¹⁰⁸ George Leslie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298；馬偕原著，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287。

前端上翹，鞋身上繡有蝙蝠、鹿、烏龜、喜鵲等吉祥物，有些婦女另特製大紅弓鞋，又稱「喜靴」，在結婚時使用，守喪期間則穿白色或深色喪鞋，或生前準備三寸壽鞋以備身後之用。¹⁰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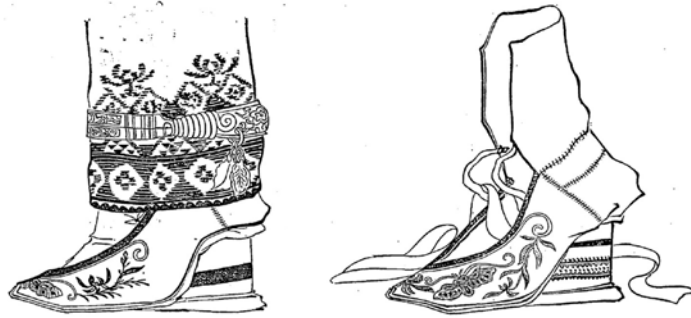


圖7、三寸金蓮

資料來源：差不多翁，〈纏足〉，《臺灣土語叢誌》，第4號（臺北：博文堂，1900年），頁12附圖。

此外，有關未纏足的女性鞋履，研究者也指出「臺灣客家婦女以自然天足、勤勞操持為尚，平日工作多赤足或穿著草鞋，晚間盥洗後則穿著繡花拖鞋，南部客家婦女另有一種繡花珠鞋，鞋面以綴珠刺繡圖案。」¹¹⁰ 不過，光從字面判斷，我們並不能知道研究者所關注的是什麼時代，史料中也未見繡花拖鞋或珠鞋的記載，然而根據片岡巖的採集，臺灣人有項習俗規範，當新娘從床上下地時，決不能踩踏到丈夫的鞋子，此為大忌。¹¹¹ 至少可以用以證明臺灣民眾在睡前是穿著鞋子或拖鞋的。

¹⁰⁹ 柯基生，《千載金蓮風華：纏足文物展》，頁24-27、80、82-83。

¹¹⁰ 方瑞華主編，《古典時尚·織繡風華：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專輯》（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2年），頁53。

¹¹¹ 片岡巖，《臺灣風俗誌》，頁837。

伍、結語

1874（同治13）年4月7日，馬偕等人「在一個城鎮的街道上遭到50名孩童與6個男人的辱罵。嘲笑我們打赤腳。」¹¹² 漢人嘲笑馬偕等人赤腳，可見民眾不僅有穿鞋的文化，而且以穿鞋與否作為文明與否的標準。

本文嘗試從史料之中抽絲剝繭，爬梳清治時期臺灣民眾穿鞋的文化，可得以下結論。

首先，清治時期臺灣民眾所穿之鞋履，充分展現臺灣文化中摻雜著「中國」與「在地」兩大因素的特徵，先民帶著原鄉的服飾文化渡海來臺，但由於島內並不多產布帛，在當時臺灣的物資流動主要是與中國往來的貿易架構下，民眾習穿的布鞋多來自於中國沿岸各地，型態也與漳、泉、粵等原鄉較接近。另一方面，為適應臺灣炎熱潮濕的氣候，以及遇雨濕滑的道路條件，就地取材製成的草鞋亦成為在地民眾穿用鞋履之大宗，仰賴在地女性人力編織而成，物美價廉，經濟實惠，即便晚清時期臺灣因開港而接觸西方經濟、宗教等勢力，卻少見到臺灣人受到西方文化影響而改穿皮鞋的現象，反而是馬偕等西方傳教士或軍人在各地宣教或行軍時，多穿著草鞋，以適應臺灣特殊環境的變化。

其次，鞋履文化也突顯階層上的差異。中上階層的人家，因家境富裕，衣著鞋履日趨華美，不僅使用絲羅綢緞訂製各色鞋履，且稍見破舊即丟棄，展現臺灣移墾社會中豪紳奢華的一面；一般民眾的鞋履則以黑色布鞋或草鞋為主，為因應農耕的需要，多有終日赤足，僅在年節喜慶時穿著鞋履者。

第三，早期原住民多跣足，少部分文獻可見原住民穿著皮製鞋履追逐狩獵的紀錄。之後，隨著原住民的漢化，也可見到服飾穿著趨近於漢人的現象。

1906（明治39）年，《臺灣協會會報》刊出這樣的一則文章：

鞋子則是臺縣鞋的鞋底很平，走起路來不合腳，對於內地人來說，並不是容易穿的鞋子，近來臺人穿著這樣的鞋子也感到腳痛，改穿普通的皮

¹¹² 偕叡理原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 I 1871-1883》，頁161。

鞋或橡膠鞋的情形多了起來。平常有在穿鞋的人，在穿著臺式禮服的時
候，就像是儀式一般，必得穿臺灣鞋，這種時候，常常可以聽到人抱怨
腳痛到沒辦法。品質好一點的臺灣鞋要價四、五圓，而西式的皮鞋或布
鞋，便宜者僅兩圓就買得到，而且設計反而不錯，因此相較之下，可以
說是捨鞋而就靴，想到在本島人之間銷路較好的是橡膠鞋和布鞋這件
事，多少和這有一點關係。……

內地的木屐（下駄）需求大增這件事也很令人驚訝，男性從一開始，天
然足的女子等等，要買雙鞋子也要花個幾圓，但是木屐卻是五、六十錢
就買得到，其中流行的附底草鞋（板附草履）也令人讚不絕口。¹¹³

過去作為民眾服裝配件之一的中式鞋履，到了日治以後，隨著日本人帶入有
別於過去的服飾與配件，難免受到日本的影響，鞋子的材質與花樣逐漸多樣化起
來。概要而言，日治以後，民眾穿鞋的習慣雖然固定下來，但鞋款的選擇，雜揉了
製作技術、商品價格、穿著舒適度等製鞋條件的演進，以及不同性別（男女有
別）、不同場合（如上學）、不同服裝風格（如西化或日式服裝），甚至是個人
意識形態等多重因素而有所不同，產生多樣性及重層交錯的現象，「足」下的一
片天地，未來可在本篇的討論基礎上，廣續關注與開發。

¹¹³ 著者不詳，〈臺灣風俗の推移〉，《臺灣協會會報》，第96號（東京：臺灣協會，1906年
2月），頁30-31。

附錄1、臺灣鞋半成品之種類、產地及原價

	型別	品名	產地	單位	原價	摘要
鞋面	廈門型	棉口廣柳面	漳州	一雙	2.20角	
		緞口絨福面	漳州	一雙	4.60角	
		緞口淺面	漳州	一雙	2.60角	
		棉口淺面	漳州	一雙	2.20角	
		緞口廣北面	漳州	一雙	3.80角	
	廣東型	二恒緞鞋面	廣東	一雙	2.70兩	
		二恒布鞋面	廣東	一雙	1.60兩	
		二恒 字蝶面	廣東	一雙	5.20兩	
	福州型	元頭綉片面	福州	一雙	3.00角	
		緞 鼻洋片	福州	一雙	4.00角	
		緞 鼻洋面	福州	一雙	4.75角	
		絨 鼻洋面	福州	一雙	3.65角	
		職執金面	福州	一雙	6.70角	金色刺繡縐子鞋面。
		天津綉龍面	福州	一雙	4.80角	
		廣式綉面	福州	一雙	6.00角	
		綉絨鞋仔面	福州	一雙	1.40角	
		光絨洋面	福州	一雙	2.00角	
		絨廣式面	福州	一雙	4.00角	
		龍鞋面	福州	一雙	3.50角	
		鼻洋鞋片	福州	一雙	3.70角	
鞋底	廈門型	一毡廣柳底	漳州	一雙	4.00角	一片氈，鞋內底面附有皮革。
		一毡淺底	漳州	一雙	3.10角	一片氈。
		三毡淺底	漳州	一雙	3.90角	三片氈。
		五毡淺底	漳州	一雙	4.60角	五片氈。
		四毡廣北底	漳州	一雙	4.80角	四片氈。
	廣東型	七西鞋底	廣東	一雙	3.40兩	七片氈。
	福州型	廣毡底	福州	一雙	4.00角	
		廣女底	福州	一雙	4.00角	
		洋式炆皮底	福州	一雙	3.50角	
		洋式底仔	福州	一雙	2.00毛	
		福安底	福州	一雙	3.20角	
		薄紙底	福州	一雙	2.60角	
		單皮底	福州	一雙	3.20角	一片氈，附一片皮鞋底。

搗線	-	-	漳州	千條	9.40角	粗線。一千條重約三斤半。
			福州	千條	9.00毛	粗線。一千條重約三斤半。
			福州	千條	4.00毛	細線，又稱縫線。
			臺灣	一斤	0.30圓	市價。
布述	-	-	漳州	百條	2.80角	將綠色棉布折成四分之一寸之後，中以苧麻線穿過。
中底皮	僅廈門型	-	臺灣	百斤	30圓 48圓	1.市價。 2.水牛皮，一雙約6、7錢。
			清國	百斤	40圓	

資料來源：田邊一郎，〈支那靴調查報告〉，頁26-27。

附錄2、完全本地製作鞋之種類、產地及原價

	品名	產地	單位	原價	市價	摘要
布幫	厚款	漳州	一片	1.70角	0.30圓	
	薄款	漳州	一片	3.00角	0.60圓	
		臺灣	一片	-	0.60圓	
棉毡	廈門毡	漳州	一片	2.00角	0.40圓	紙質含量少
	福州毡	福州	一片	3.50角	0.70圓	紙質含量多
	西毡	北清	一片	1.00圓	-	不含紙質
馬古皮	-	北京		一斤3.00角	百尺2.00圓	京皮

說明：完全本地製作鞋所用之布述為綠色棉布或水藍色細織布，搗線、中底皮則與半成品鞋相同，鞋面用布帛及鞋裡用綿布有深藍色（紺色）綿布、黑綿布、淺黃綿布、茶色綿布、白色棉布、緞子、縐子、毛呢（Italian cloth）、錦緞（brocade）、天鵝絨等多種材質。

資料來源：田邊一郎，〈支那靴調查報告〉，頁27。

徵引書目

一、史料彙編

丁紹儀，《東瀛識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種，1957年。

片岡巖，《臺灣風俗誌》。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年。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13種，1961年。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風土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46種，1962年。

白麓六十七居魯甫（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出版項不詳。

朱景英，《海東札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9種，1958年。

西岡英夫，《台湾の史的環境と被服竝にその資源》。出版項不詳。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07種，1961年。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21種，1962年。

吳德功，《彰化節孝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3月。

村上玉吉，《臺灣紀要》。出版項不詳。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1962年。

林 豪，《澎湖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64種，1963年。

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簡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02種，1964年。

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63種，1960年。

林獻堂等編，《臺灣霧峰林氏族譜》。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98種，1971年。

姚 瑩，《中復堂選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83

- 種，1960年。
- 施 琅，《靖海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3種，1958年。
-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304種，1972年。
- 胡 傳，《臺灣日記與稟啟》。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71種，1960年。
- 胡建偉，《澎湖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09種，1961年。
- 范 咸，《重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05種，1961年。
- 徐 珂，《清稗類鈔選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14種，1965年。
- 屠繼善，《恆春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75種，1960年。
- 許南英，《窺園留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47種，1962年。
- 連 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28種，1962年。
- 連 橫，《臺灣語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61種，1963年。
- 陳文達，《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24種，1961年。
-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1977年。
-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60種，1963年。
- 陳肇興，《陶村詩稿全集》。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文獻叢書》，1978年。
- 著者不詳，《平臺紀事本末》。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6種，1958年。
- 著者不詳，《安平縣雜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52種，1959年。

著者不詳，《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47種，1968年。

著者不詳，《嘉義管內採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58種，1959年。

著者不詳，《臺案彙錄》庚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00種，1964年。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1957年。

蔡振豐，《苑裡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48種，1959年。

諸家，《臺灣詩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80種，1970年。

諸家，《臺灣輿地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16種，1965年。

鄭鵬雲、曾逢辰，《新竹縣志初稿》。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61種，1959年。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1962年。

藍鼎元，《平臺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4種，1958年。

二、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王育德，《王育德自傳》。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

必麒麟（W. A. Pickering）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臺北：原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原著，費德廉（Douglas L. Fix）、蘇約翰（John Shufelt）主編，《臺灣紀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年。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年。

偕叡理（Rev. George Leslie MacKay）原著，王榮昌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 I 1871-1883》。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12年。

- 愛德華·豪士（Edward H. House）原著，陳政譯述，《征臺紀事——武士刀下的牡丹花》。臺北：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
- 達飛聲（James W. Davidson）原著，陳政三譯著，《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4年。
- Campbell, W. Rev. *Sketches from Formosa*. London: Marshall Brothers, undated.
- Davidson, James W.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 Company and Yokohama, Shanghai,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Kelly & Walsh Ltd., 1903.
- House, Edward H. *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 Tokio: Unknown, 1875.
- Le Gendre, Charles William. *Note of Travel in Formosa*.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2012.
- Mackay, George Leslie. *From Far Formosa*. Chicag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6.
- Pickering, W. A. C.M.G. *Pioneer in Formosa*. London: Unknown, 1898.

三、雜誌、報紙

- 《經友》，第4卷第3號，臺北，1935年。
- 《臺關》，第22期，臺北，1908年。
-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897-1911年。
- 《臺灣協會會報》，第7、96號，東京，1899、1906年。

四、專書

- 方瑞華主編，《古典時尚·織繡風華：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專輯》。高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2年。
-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 林滿紅，《茶、糖、樟腦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960-189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 柯基生，《千載金蓮風華：纏足文物展》。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3年。
- 高彥頤（Dorothy Ko）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

變》。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7年。

曹永和，《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青年曹永和的學術啟航》。臺北：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2011年。

葉立誠，《臺灣服飾史》。臺北：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第2版。

鄭惠美，《儒式婚服研究與設計》。臺北：中華亞太藝術文化交流學會，2015年。

鄭維中，《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臺北：如果出版社，2006年。

蕭瓊瑞，《島民·風俗·畫：十八世紀臺灣原住民生活圖像》。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3版。

蘇旭珪，《臺灣早期漢人傳統服飾》。臺北：商周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

五、期刊、學位論文

江韋陵，〈傳統社會審美觀之研究——以金蓮文化的藝術表現為例〉。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

吳奇浩，〈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揉的臺灣漢人服裝文化（1624-1945）〉。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2年。

吳奇浩，〈喜新戀舊：從日記材料看日治前期臺灣仕紳之服裝變化〉，《臺灣史研究》，第19卷第3期（2012年9月）。

金湘斌，〈纏足から天然足へ：日本統治前期（1895-1925年）台湾における学校女子体育に関する研究〉。金沢：金沢大学大学院人間社会環境研究科博士論文，2013年。

徐端儀，〈臺灣『水姑娘』百年物語——傳統理想女性美研究1861-1960〉。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張淑雯，〈日治時期臺灣解纏足運動之研究〉。虎尾：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

黃依琳，〈1872-1934上海女性足飾流行變遷之研究——以《申報》為例〉。臺北：天主教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

黃靜儀，〈平埔族婦女形象與角色的變遷（1603-1895）〉。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